

黄新聪：良师益友司马文森

下

生，毫无保留地向他诉说，希望他为我指点迷津。1948年夏，我在坤甸中华中学读初中二年时，国民党党员的校长李XX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，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，还公然纵容他手下的三青团份子搜查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书桌，我是被搜查中的一员。当时我们很气愤，不少同学打算退学。我给司马文森先生反映了这个情况。很快接到他的复信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他没有支持我退学，也没有鼓动我们向反动校长作坚决斗争。反而希望我要珍惜读书的机会，不要轻易退学，要我相信学校中还有很多心地善良、有正义感的老师和同学，相信社会上有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。语气极为平和、低调。果然不出司马文森先生所料，年底，在进步侨社的支持下，训导主任宋庆玉先生另组新的中华中学，因此我才没有中途辍学，继续读完



初中课程。

1950年初中毕业前夕，我汇款给司马文森先生，请他帮我买一本精致的纪念册，并恳请他题写赠言。很快就接到司马文森先生帮我买的纪念册，但他并没有给我题写赠言，而是附了一纸简单的信：“黄新聪同学，你要的纪念册，我帮你买了，你要我题写赠言，我想就不必了，你还是请你的老师和同学题写吧，他们给你的赠言才是最宝贵、最永恒的。”信末给我留下他在香港九龙的地址和电话，约我回国途经香港时同他晤面。这几句简单朴实的话语，体现了司马文森先生谦虚的高尚人格和品德，给我留下了终身

难忘的记忆。

同年7月我回国路过香港，住在港岛一处专门接转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站。接待站严禁归国华侨学生外出，以防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劫持，我几次要求去九龙弥敦道拜访司马文森先生均未获准，最后只好打电话给他。我同司马文森先生在电话中简单交谈了几句，他鼓励我要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和工作。年底，我参军离开广州，再没有同司马文森先生联系了。

1956年国庆刚过，我到北京出差，遇到从印尼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的《黎明报》总编辑张世成先生。张先生说，他回国时在大使馆的欢送会上，文化参赞司马文森先生特意向他打听

现在投笔从戎，当了新中国的空军战士，算是圆了他的‘少年梦’”。没想事隔六、七年，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启蒙老师，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，还记住我这个海外青年学生。我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司马文森先生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、杰出的外交家，他还是海外青年的知心朋友和革命引路人，他为培育和推动海外华文事业呕心沥血，许多当年受过他教诲的海外青年学生忆起往事，无不魂牵梦萦，心怀由衷敬意！

注：本文写于2016年4月，原标题为《导引我革命人生的师尊——忆司马文森先生的教诲二三事》。

《人民政协报》刊登此文时标题改为《良师益友司马文森》，并对文章略作删节。

司马文森（1916～1968年），原名何应泉，泉州东街人，我国著名作家、外交家，第一届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。

他1931年参加革命，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在《申报》《作家》等报刊发表多部揭露现实的短篇小说，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。

八年全面抗战时期，司马文森有四年军旅生涯：正规军、军校、游击队。他亦文亦武，先后在上海、广州、桂林从事救亡宣传工作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把港澳和南洋的进步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，并为解放区输送新生力量。其间，司马文森撰写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和小说。

1949年，司马文森和胡子昂、李铁民等人北上，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，共商建国大计，参与《共同纲领》的定稿工作，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为此连续创作《新中国的十月》《会师记》等反映新中国成立的报告文学集。

1955年夏，司马文森奉派出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，1962年秋回国后，担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、非洲司司长。1964年，司马文森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。

黄新聪 印尼视角

